

心智模式下学校合唱音乐育人路径

施雯¹, 杨中启²

(1. 集美大学师范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2. 贵州师范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1)

[摘要] 学校合唱音乐教育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了高度重视, 由于科技水平的高度发展与传统教育模式相互作用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 学校合唱音乐教育正在经历着关联性的进化与转向。学校合唱音乐教育是通识教育的特色方式和重要内容, 既能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也能有效促进学生的心智培养, 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弥合分歧、相互协调的心理意识; 在共情与共鸣中培养社会精神; 在文学性与音乐性二美相兼形成的艺术表演中, 引发起无尽的想象, 获得超越的美感, 从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关键词] 心智培养; 合唱音乐; 育人路径

[中图分类号] G 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3) 04-0037-08

心智模式 (mental model) 最早是由英国心理学家 Kenneth Craik 提出来的, 是一种用于描述、预测和揭示外部事件的认知结构^[1], 后被认知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所采用, 个体深藏于心中的假设、成见、印象等是心智模式的体现, 它们影响着个体认知世界和采取行动的方式。国外学者多从心理学的角度阐述心智技能 (intellectual skill) 的培养。加涅 (Gagne, R. M.) 认为个体在心智技能模式培养下, 通过符号或观念的应用于自身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加里培林 (Gal'perin) 从五个阶段论述了心智技能培养过程分别是活动定向阶段、物质活动阶段、有声语言阶段、无声外部语言阶段以及内部语言阶段^[2]。心智技能培养多集中于数学、物理和历史三大学科领域中, 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信息技术能有效支持心智技能培养。朱广艳认为数字化的科学探究过程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发展科学思维^[3]。心智技能培养可以通过学习而形成合乎法则的心智活动, 我国学者冯忠良提出心智技能培养的三阶段理论, 分别是原型定向、原型操作、原型内化阶段^[4], 这是学界目前比较认可的方式。在学校音乐合唱中, 心智培养的提升难度比知识和技能的提升难度大, 且不容易控制。心智培养的提升个体通过与他人交往与互动来亲身体

验, 根据体验结果调整自身行为模式, 进而提升心智技能。心智模式的核心是个体不易被外界观察到的内心深处世界, 将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与思政教育类似的是, 心智模式同样是通过心理建设来影响人们的心理活动, 两者都追求内在的秩序感, 都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打通与内在心理世界的链接。虽然对合唱的教育作用已经得到很多实践者与研究者的认可, 但是在现今的教育实践中, 人们往往把校园里合唱音乐活动定位为活跃校园文化气氛, 对于如何运用合唱教育来提升心智技能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当前, 合唱音乐在思政育人方面存在认知不够到位、措施不够丰富、渠道不够畅通等问题。其实, 学校合唱音乐教育应该同时视为通识教育的重要方式和内容。合唱音乐教育作为一种需要共同配合来呈现的艺术形式, 能够通过合唱这一共同行为来潜移默化地影响参与者的心理活动, 进而推动合唱者内在偏好的改变, 实现拓展心智模式培养方式的目标。心智模式有利于破解传统音乐教育存在的学习门槛较高、人才和硬件设施配套不足、普及面不广等问题, 以合唱音乐教育与心智技能提升的结合为突破口, 不局限于传统音乐教育偏重对音乐技艺的培训, 充分发掘音乐教育的育心化人功能。通过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合

[收稿日期] 2022-10-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专项重点项目“疫情防控‘大思政课’育人研究”(21VSS011)

[作者简介] 施雯 (1979—), 女, 台湾人, 福建省集美大学师范学院讲师、厦门市音乐家协会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音乐欣赏、钢琴演奏。

唱的基本知识,使每个学生都具备一定的合唱指挥能力,并自觉地利用它进行心智培养,培养学生的个体独立与团体协调意识,涵养学生在共情与共鸣中的社会精神,以及可能引起的审美想象与心境超越。

一、心智模式下合唱音乐教育述略

深刻认识到合唱音乐教育所带来的作用,可以从合唱音乐的发展史中找到依据,并且通过其历史影响,来更加明确合唱音乐教育带来的独特意义。同时能够分析找出更好契合我国音乐教育的模式,以扩充我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人类在追求音乐之美时,发展出合唱音乐这一门类艺术形式。合唱音乐在人类音乐史上源远流长,形成一整套集演唱技能、乐理知识、表演形式等元素构成的知识体系。中国合唱教育在学习借鉴西方合唱音乐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开创性地发展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学校合唱音乐教育体系,并且在与思政育人结合方面开拓出新的天地。

(一) 西方合唱音乐的发展历程

西方合唱音乐的形可追溯到欧洲距今千年的中世纪宗教音乐,其产生和发展被打上宗教的烙印,具有浓厚的宗教情怀。中世纪宗教合唱中,经文歌具有浓厚的世俗气息,14世纪中期,以马肖为代表的“新艺术”时期的作曲家,使用教堂复调手法、声部模仿技术和乐器演奏等使其音乐作品取消宗教色彩,倾向于世俗化。进入文艺复兴以后,欧洲音乐中心开始北移,英国音乐出现了全新的面貌,以鲍尔和邓斯泰布尔为代表创作的合唱音乐作品对欧洲大陆作曲家产生重要影响。16世纪后,世俗合唱在其他国家得到迅速发展,此时的合唱艺术中带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教堂合唱以及教堂复调艺术的发展为合唱艺术的兴起奠定基础。

合唱艺术是一种团体性和普及性的艺术。它可以由专业的艺术团体进行表演,也可以由最普通的社会团体组织进行;它可以是拥有复杂乐队伴奏的“阳春白雪”,也可以是没有任何伴奏的“下里巴人”;它可以登上世界级的比赛舞台,也可以活跃在学校、工厂、军营的任何一个角落。

西方合唱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体现合唱音乐对于人的审美、团队协作精神甚至是一些意识形态与思想都具有一定的作用。合唱音乐的这些特点赋予了合唱音乐可以作为教育方式引入现代教育模式的

可能性。同时,合唱音乐模式的多样性,也给学校探索合唱音乐教育以更多的选择。

(二) 我国合唱音乐教育发展历程

与西方的合唱音乐发展历史相比,我国的合唱音乐发展时间还比较短。我国的合唱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借鉴了西方合唱音乐的合理部分,并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内容和形式。我国的合唱音乐发展起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今只有百年的历史^[5]。随着西方音乐文化的输入,合唱音乐,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国的合唱曲最早出现于“学堂乐歌”的编撰中,即当时的中、小学生的音乐课是以集体歌唱的方式体现。到抗战时期,以冼星海等为代表的《救国军歌》《黄河大合唱》被称为合唱之魂。

音乐的构成被开放性的划分为“形”与“意”两个层面:“形”包括了可以为人所直观感知的声音或物态化特征,“意”则特指那些不可言传的文化哲理与精神境界^[6]。从中国合唱的歌词内容看,中国合唱音乐是一个历史的缩影,合唱音乐经过历代作曲家坚持不懈的努力探索,经历了从无意识的西方一元论到有意识的中西融合,从抗日战争时期的民族性逐渐到具有包容性、创新性、丰富多元化发展,在展现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作用今天仍可以充分体现在学校的教学中,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减。仔细研究与分析中国合唱音乐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能发现其背后蕴含的深刻历史使命,中国合唱音乐发展较为突出的时期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抗战时期的合唱音乐。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许多作家使用简单的结构形式和音乐语言来适应当时群众歌咏,中国合唱音乐才逐渐走上民族化的正轨。抗战时期的合唱音乐多呈现出革命性的特点,民众抗战热情空前高涨,无论是抗战区还是国统区,合唱音乐家以及歌咏团体在敌后开展声势浩大的“以歌援战”运动,合唱音乐成为全民参与的重要群众性活动。如李凌、赵三风等人于1939年10月在重庆建立抗日救亡音乐组织——新音乐社^[7],这些歌咏活动从侧面反映了音乐家和人民群众在艰苦的环境中顽强抗战、百折不挠的时代精神。

第二,20世纪50年代的民歌合唱。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开始兴起民歌合唱,将各地的民歌改编为合唱的形式成为当时的潮流,呈现出民

族性的特征。民歌合唱得以发展的原因有以下方面:一是建国初,业余和专业合唱团队的建立,迅速提高队员的演唱能力;二是外国合唱团为我国的合唱音乐提供了借鉴经验。1956年,我国在北京举办的“全国音乐周”,使我国合唱音乐走上创作的高潮。

第三,改革开放后民歌合唱。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中国合唱音乐的复兴奠定经济文化基础,经历20多年,诞生许多专业合唱团体,合唱作品逐步多元化,一大批有民族特色合唱作品及由民歌改编的合唱作品也应运而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特点,如我国各大音乐院校的合唱课程逐步完善,合唱专题讲座、合唱指挥培训班也随之兴起,为今后合唱艺术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这三个时期涌现了许多经典作品,这些作品都是合唱音乐发展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为中国现代的合唱音乐教育发展奠定基础。

(三) 我国学校合唱音乐教育生态现状

所有的合唱音乐文化都不会脱离变迁的命运,教育合唱音乐也是如此。在当前高校里,从学生到领导,对合唱的艺术观念,部分偏离合唱精神真正追求的境界。学生参加合唱团多是出自某种利益——违背合唱精神,学校领导也较少关心学生的素质,不了解学生在合唱艺术教育中的潜力,认为合唱团就属于群众性活动,这些都不利于学生提高音乐修养和激发音乐思维,更不可能触发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潜力。

心智模式培养属于人们潜在对应方式和认知结构,在弗洛伊德“冰山理念”中,水面下的冰山藏着巨大的、潜在的心智模式,其培养途径就是通过传统的专业教育模式对知识和技能进行学习、培训、反复练习。心智技能培养是学生思维方式、方法转变的复杂过程,主要以思维为核心,在人的大脑中借助语言对客观事物映像进行加工改造,掌握正确的思维方式、方法是心智技能的本质特征。缺乏心智培养的高等教育会造成学生的发展片面、缺失,没有良好的心智模式,学生就无法拥有健康的心态,不能很好地融入社会,心智模式培养,决定学生在社会的适应性、成功与幸福。18-24岁是心智模式培养的重要阶段,人生观、价值观奠定心智模式的基础,学校合唱团等集体性活动是学生个体独立走向团体发展的初次尝试、是完善心智的良好途径。

二、心智模式下学校合唱音乐育人表征

在合唱艺术已经为世界各地普遍重视并且成为校园音乐教育的重要部分之后,1945年哈佛大学的哈佛委员会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出版的《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对此提出如下分析:“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与他人共同生活,我们需要社交也需要独处,而音乐艺术就能培养社交技能。例如,在唱诗班中唱歌或者在管弦乐队里演奏,都能把自己融入一个大的训练有素的团体中,而且不失自己的独立性。因为就是通过扮演一个具体的个别的角色,个体能够促进组织表演的有效性。并且,因为音乐并不表达清晰直接的想法,所以音乐表演团体中也没有辩论或争吵的机会。这样,艺术可以将在其他方面存在分歧的人们联合在一起。作为个体的人,即使在学术能力上存在差异,也都能动容于艺术的感性魅力,公共节日或宗教典礼就是例证。”^[8]这段精到的分析,是建立在对当时的中学与大学的音乐教育的深入调查基础上的,它明确提出合唱艺术对团体协调意识的培养作用,在通识教育与音乐教育研究中意义深远。虽然这里举的例子仅仅是“在唱诗班中唱歌或者在管弦乐队里演奏”,但其实所有的具有合唱性质的校园音乐活动都是如此。

(一) 个体独立与团体协调

时至今日,合唱艺术早已从简单的异口同声的形式发展为多声部复杂组合的艺术形态,是包含着同声的、混声的齐声、轮声、领唱、重唱以及和声的、支声的、复调的、有伴奏或无伴奏的一种集体歌唱艺术,也在艺术教育实践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个性化探索;但是,无论如何,它根本的艺术特征没有改变,那就是在同一个指挥之下,众人采取积极合作的方式进行艺术表演。在表演中,所有人都必须放弃其他方面的不同意见或立场冲突,按照指挥的艺术构想进行表演,不论是声音的高低,起止的节点、节奏的把握都不得任意妄为,于是,这就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我们弥合分歧、达到协调的心理意识。

这是很有意思的艺术教育现象。作为一般的学术教育或知识教学,强调的是对不同思考的启发,甚至鼓励学生在教与学的互动中表达自己的不同见解,独立思考和发现问题被视为教学的高

级境界。特别是现代教育理念,提倡的是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是对学生思维的有效启发,启发他们的独立思考、独立创造;所以我们往往会看到“众声喧哗”的课堂。但是,在合唱艺术教育中,自然而然地突出着服从与协调的团体意识,这对于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健康发展都是非常必要的。

健康的社会必然尊重个人的自由和个性化表达的权利,但同时又要求个体之间的互相尊重,要求个人对社会共同秩序的服从。也许在其他场合,人们可以自由争执,可以坚持自我,但是,当你成为合唱团体一员的时候,你不仅必须服从指挥,照顾到他人的演出要求,你还必须用规定的音调、音高等来表演,彼此配合,互相呼应,才能构成具有表现力的合唱。而每一个人在其间有制约的发挥和有个性的表达,同时都可能转化成特别的心灵体验。当这种心灵体验转移或者放大之后,也可能对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良好秩序的形成与维持产生一定的影响。

比如,由周长征作词、宋铭筑谱曲的《月下情歌》^[9],歌词非常简单,主要是这样几句:

月亮,弯弯的月亮,
你是一只船,
飘荡在彩云间。
载着我的思念,
捎去我的心愿,
到我那日夜牵挂的阿哥身边……

这是表达男女思念之情的。但是,在曲谱中,为了增强表达效果,设计了21个小节的复杂合唱,有“女合”“女领”“男高”“男低”“女高”“女低”的不同调配,还在简单的歌词中加进大量的“哎噜”“哦嘞”“哩洛塞”这样的语气词。如果按照这个构思合唱,处于不同声部、担任不同任务的每一个歌唱者都可以在互相的协调中得到特别的心灵启发。

再如,由著名诗人徐志摩作词、著名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作曲的《海韵》^[10],写一个单身女郎留恋在黄昏的海边不愿归去的情形与心情,原词也比较简单。而《合唱歌曲大全》中呈现的合唱组合则特别复杂。开头是女高音、女低音和男高音男低音的组合,接着有女高引领,“男高音Ⅰ、男高音Ⅱ”和“男低音Ⅰ、男低音Ⅱ”等等不断轮回的复杂组合。那么,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

候,所有人都必须在统一的指挥下,按照既定的高低长短、顺序先后、起承转合,才能构成优美的艺术表演,而所有人也都有可能得到个人表现与统一协调的体验。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有了这样的心灵启发,就一定可以促成相应的行为效果,笔者只是强调,这样的合唱艺术在心智培养上的潜在可能。

(二) 共情共鸣与认知增进

合唱还有一个人们已经充分认可的作用,即情感的培养和思想的改善,而从更深的层次来说,这也可以视作心智培养的重要方面。合唱歌曲的创作,许多都源于特殊的历史语境,或者说都与国家、民族的际遇密切相关,有着显明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情感表达的共同性,也容易激起深刻而广泛的共鸣。

从20世纪以来,在校园里最为流行的此类歌曲有《长恨歌》《黄河大合唱》《在太行山上》《游击队歌》《长征组歌》《祖国颂》《我爱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等等,分析它们的影响作用,即是如此。像《黄河大合唱》,诞生至今,已经过去了80余年,它诞生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早已过去,但是,它至今仍然具有激发强烈情感共鸣的艺术力量,它对于后来人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抗日战争的叙述,而是在内心深处激发起人们关于战争、灾难、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与情感共鸣。而《长征组歌》是在长征结束之后30年的1965年,由长征的亲历者萧华将军创作的合唱歌曲。它不像《黄河大合唱》那样的具有即时性的创作特点,但是,它同样能够激发人们深刻的内心感情,并深化人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也就是说,它所激发的不仅仅是对极端艰难困苦之中的“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长征者的崇敬之情,还有对历史的反思,对人在艰难困苦环境中的选择与坚韧的思考,因而形成了《长征组歌》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在现代,这类歌曲往往是由学校或者其他团体在特殊的纪念活动中演出的,组织者也往往出于政治教育的目的而组织,却忽略了这些歌曲在演唱中更为深层的心智培养意义。爱国精神、英雄主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民族精神,但它最能触动人心的不是舍生取义的道义感,而是生命的归属感,精神的崇高感,以及当美好的生命被摧残时内心的惋惜、同情与激愤,这些,对于提升学生的历史认知、政

治认知都有特别的意义。

还有一类合唱歌曲,多是个人情感的表达,爱慕之情、离别之情、思念之情居多,如《月下情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等。这些多是从人的最本真、最具体的际遇出发而形成的感情表达,极容易触动人的内心,而在心智培养上,也有着化解心灵、舒散郁结从而增强心智的作用。我们在人生中都可能有类似的情感际遇,但我们不一定都能把它谱写成歌曲,当我们借他人所创作的歌曲,而且是在一个合唱团体相互启发、相互触动中歌唱的时候,我们内心曾经的郁结、不快、失落等等都有可能得到一定程度地化解,因而,也增进了我们对如此人生的心理认识。比如李叔同的《送别》,是中国较早的学堂乐歌和合唱歌曲,但是,它的创作缘起并非是因为校园中的人群,而是因为与好友许幻园的送别而成。不过,由于这首歌很自然地采用了“长亭”“古道”“芳草”“晚风”“夕阳”“笛声”“天涯”“浊酒”“别梦”这些古典诗词中常见的抒写离别之情的意象,融化入自己独特的人生感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有着强烈的化解作用。特别是当它在毕业告别仪式上唱起的时候,那种既是个人的、又是群体的情感表达往往在泪水的冲刷之中形成心灵的强烈触动,而对于人生的悲欢离合、对于人间的友谊关系等方面的认识也会在这里默默加深。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所叙述的音乐老师马修在“池塘底教养院”以合唱音乐改变问题孩子的人生认识、精神状态的故事,更是对这一作用的形象生动地阐释。

“致乐以治心”(《礼记·乐记》),意即通过音乐来调理人的心灵。《荀子·乐论》中也提到:“夫乐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夫声乐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谨为之文。”这则是认为,音乐之所以能够调理人的心灵,是因为它“入人也深”“化人也速”,同样可以作为我们认识合唱的心智培养作用的佐证。

过去,我们比较多的重视合唱这一特殊音乐形式的宣传鼓舞作用,但如果我们能进一步认识到它的心智培养作用,并有意地予以“利用”,意义就更加深远了。汉代扬雄《法言·先知》中说:“鼓舞万物者,雷风乎!鼓舞万民者,号令乎!”“号令”式的鼓舞可以用在合唱歌曲之中,发出共

同的社会号召,激发共同的情感与认识;非“号令”式的情感抒发用在合唱歌曲之中,不仅可以表达感情、化解郁结,更可以增进我们对人生、特别是偶然性的人生际遇的认识,这些也都具有心智培养的潜在可能。

(三) 审美想象与心境超越

从审美的角度认识合唱艺术也是非常重要的。迥异于当今最为流行的歌星演唱,是合唱中的每一个人既是音乐的参与者,同时也是自身演唱的欣赏者,这种双重身份,往往可以使他们在优秀的歌曲合唱中激发特别的审美想象,并获得一定时段的心境超越。

一方面,在现今流行的歌星演唱中,群体都处于听众的位置,能够激发他们热情的往往是明星崇拜和场面刺激,而真正的情感共鸣和审美欣赏倒可能退居于次要地位。团体合唱,特别是学校里的团体合唱活动与合唱教学则不同,其间的每一个人都是表演者,也都是欣赏者,他们不仅可以自我欣赏、自我陶醉,更可以在“异口同声”的歌唱中,让心灵进入到一种审美想象的超脱境界。

另一方面,合唱能够引发的审美想象不仅来自于身在其中的体验,而且还来自于合唱歌曲的文学性与音乐性“二美”兼具融合成的审美感发。对于政治倾向性非常强烈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最初是1939年诗人光未然创作的朗诵诗《黄河吟》,后来由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谱为曲谱,成为气势磅礴的八个乐章的大合唱。从歌词的角度来说,《黄河船夫曲》模拟黄河船夫划船时的号子声,中间加入“决一死战”表达民族大义的词句,虽不是整齐的诗词,却在形象生动的描写与呼号中展现出强大的精神力量。而《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河边对口曲》《保卫黄河》这些章节,或如登高呼号,或如痛苦呻吟;有时哀婉悲凉,有时又慷慨长歌,完全可以认为是中国诗史上绝无仅有的伟大诗篇。冼星海谱曲之后,文学之美与音乐之美融合,更使每一个歌唱者和欣赏者,都能从中得到超越于自身、超越于现实、甚至超越政治主题的审美想象。

而且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诗乐舞本来是三位一体的,而诗又往往是音乐和舞蹈的灵魂,音乐与舞蹈又往往与诗的意境相配合。到了近代,优秀的合唱歌曲的创作,绝大多数都建立在诗化的审美表达的基础之上。独立的诗歌朗诵或者诗

词欣赏,也能够带给我们审美想象与心境超越。但是,当它变为歌词,配以乐曲,并且成为团体性合唱的时候,带给人们的感受比独立的朗诵与欣赏又更进一层。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歌曲来组织学生演唱,有了诗的意境,又有了丰富而美好的情感与思想,还有着美妙的音乐,有着一个团体中成员之间的互相触动、互相影响,便有可能形成特别的心灵回应,成为我们心智培养的一种有效途径。

三、心智模式下学校合唱音乐育人路径

近年来,合唱艺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育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进行美育教学的重要载体,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于此同时,随着这一育人方式的开展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展开形式不够多元、教学实效相对不足、开展层次相差较大等。面对这一情况,可以扩大理论学习视野,在尊重我国学校教学实际的基础上,将国际上合理的、优秀的、有效的合唱艺术方法、方式、理念引入,以增强现行教学方式的落实效果。具体而言,可将如何调节“合唱教育”和“心智培育”的互动影响关系作为思考核心,更新相应的教学理念、教学载体以及强化合唱音乐育人的教学效力。

(一) 改进教学方式——强化学生心智模式

受2020年新冠疫情影响,教育数字化程度攀升,相应的数字资源及技术被广泛的应用于教学实践活动,线上教学模式也随之成为疫情期间完成教学任务量的重要载体,甚至因其弱空间限制性、高自由度受到了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欢迎。疫情之后,线上教学模式并未因此淡化出日常教学活动,反而在互联网相关技术的加持下活跃在教学过程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线下教学模式消失了,而是意味着教学活动的开展有了更多元的选择。如今,“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越来越普及,其有成为未来教育行业主流的趋势,这种有质量的教学手段融合,将大大提升学习的效率;因此在此时代大背景下,传统的学校合唱音乐教育更需要转变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手段,积极采取“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模式进行教学。通过在合唱音乐教育中加入线上教学,克服原有的教育模式存在的合唱专业人才不

足、教学创新动力不足、高水平教学经验稀缺等弊端,用线上同唱一支歌、线上共赏一支歌来增加学生的新鲜感,将学生的合唱曲目以短视频的方式传播得更远,增加合唱音乐教育的趣味性,提升学生参与合唱音乐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心智培养是人才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点。在改进教学方式的同时要注重心智培育,充分发挥合唱音乐在演练过程中对学生积极心理建设的正向激发作用,通过精选合唱音乐曲目来促进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认同,使学生拥有良好心智及健康的心态,让学生在合唱音乐教育的过程中能够正确面对和接纳社会现象、适应社会,在各种现实问题面前能自我调节,从而避免郁闷、自闭。

(二) 创新教学思维——培育学生心理意识

在智能时代,师生有更多的选择自由来确定音乐育人的具体载体、作品呈现方式以及日常教学方式。这意味着,在合唱音乐教学的过程中,师生不再是被动完成某项教学任务,而是主动“教与学”的过程,会一定程度地唤起学生课堂主导性的地位和作用,帮助他们认同教育目标,转化教学效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注重引导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独立实践的能力,有意识地突出“学与用”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推进艺术教育生态智能转型是音乐教育学科理论和实践教学研究主要思考方向之一。技术的快速变化对教育技术文化进展产生一定影响,因而整个教育技术文化体系在基于传统的音乐教育文化背景下,也要维系与现代音乐教育文化的关系,创新教学思维,加强艺术教育创造力的培养,打破音乐培训重音乐技艺养成而轻情感体验的思维定式。实际上,学生心理意识在教学思维创新中起着心理暗示和强化作用,同时创新教学思维对培育学生心理意识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合唱音乐教育的曲目选择上赋予学生更大自主权,让学生能够自发地带入创新的决策中去。在一定的音乐素养基础上由师生共同完成合唱的曲目,既拓展了学生的音乐创新能力、提升自我的创新意识,也对心智培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 整合教学资源——拓展学生知识圈层

艺术教育在智能技术的帮助下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能够相对高效的完成育人目的,实现效

果良好的转入—输出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世界性教育模式的转型,产出了诸多新颖的、具有创造力和吸引力的艺术科技教育成果,并且促成了音乐教育载体的迭代更新,教学资源得以优化整合,教育知识得以拓展丰富。在这一背景下,音乐教育课堂不再只是机械的完成教学任务,而是趋于开放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创造性及互动性,做到教的更灵活,学的更自主,用的更自觉。相应的教学配套机制也会随之发生改变,比如,教学评价更趋多元化,教学关系更趋平等性,教学管理更趋灵活化。当今,智能课堂已被广泛应用于艺术院校之中,其跨区域、多资源、强趣味的特性使师生能够在短时间内学习到共享资源,突破了传统教学具体地域的限制,实现了教育知识的超时空传播及传承延续。合唱音乐教育在教育资源共享的推动下,拓展了高质量合唱音乐教育资源的辐射范围,有利于将优质教育资源带给更广泛学生群体,从而为学生奠定良好音乐基础,为合唱音乐教育提供技术措施支撑,达成更好的心智技能提升效果。

(四) 优化教学平台——助推学生情感体验

合唱音乐教学活动,是教学主体行为、信息传播、数字媒介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往往发生于固定的、具体的场所之中,比如特定的音乐教室等。如今,在互联网技术的加持下,开拓了教学环境,拓展了教学介质和平台,动态化传统教学界面的同时促使教学手段趋向多元化和开放化。具体来说,智能技术丰富了教学活动展开的形式和开展的空间场域,由传统的、有面积的、固定的教学场域扩展至虚拟的、无限的教学空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物理空间对于教学活动的限制,提升了教学的功能效用。与此同时,在科学技术的策动下,展开教学活动的时机具有灵活性和自由度,可以随时随地展开教学活动,人们由此享有相对较大的选择权,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学习效率。对高校音乐育人来说,教学所用“设备”理念突破传统时空限制,不仅有助于促进教育生态变革,延展教学受众,“还进一步驱动学生‘碎片时间黄金化’,满足学生不断增长的自主性与个别化学习诉求,这是与高校学生数字化生存方式相适应的未来学习方式,”^[12]将对

学校合唱音乐教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教学平台的优化,使音乐合唱教育与学生自我学习的个性需求结合更加紧密,音乐合唱教育的过程更加关注个体的体验,有利于学生通过自发学习来主动提升心智技能水平。

总之,合唱音乐不是一种简单的社团活动项目,也不仅仅被视作“教育”的手段,还可以进入通识教育的视野,承担起心智培养的责任。超越校园的视野,考察整个社会的业余的、专业的合唱也是如此。

[参考文献]

- [1] 戚聿东,崔佳颖. 高等学校人才心智模式的培养及其路径[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0(10): 25-29.
- [2] 谢幼如,刘嘉欣,孙宁蔚,等. 智慧学习环境下学生科学探究心智技能的培养[J]. 开放教育研究, 2016, 22(2): 104-112.
- [3] 朱广艳. 有效利用信息技术培养学生科学探究能力的思考——源于数字探究实验室的案例分析[J]. 电化教育研究, 2008(4): 25-28.
- [4] 冯忠良. 结构化与定向化教学心理学原理[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295.
- [5] 汪毓和. 中国合唱音乐发展概述: 上[J]. 音乐学习与研究, 1991(1): 18-21.
- [6] 彭娟. 音乐审美结构论视角下的中国近代合唱艺术探析——以黄自合唱作品为例[J]. 四川戏剧, 2021(2): 123-126.
- [7] 廖耀东. 纵观抗战时期的中国音乐[J]. 郴州师专学报(综合版), 1996(1): 48-50.
- [8] 哈佛委员会. 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M]. 李曼丽,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05.
- [9] 四川省合唱协会. 中外合唱歌曲选[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2: 57-64.
- [10] 冯琬珍. 合唱歌曲大全[M]. 大同: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5: 115.
- [11] 陈国权. 通俗合唱歌曲选[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3: 31.
- [12] 唐进. “传统”至“现代”的腾挪: 智能化语境下高校音乐教育的生态转向[J].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9): 140-144.

(责任编辑: 上官林武)

Mental model of school choral mus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ath

SHI Wen¹, YANG Zhong-qi²

(1. Normal College of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2.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zhou, Guangxi)

Abstract: Choral music education in schools has been highly valued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our country, choral music education in schools is experiencing the evolution and turn of relevance due 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igh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original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which has produced more possibilities. School choral music education is a characteristic way and important cont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which can not only form a rich and colorful campus culture,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 students' mental cultivation, cultivati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bridging differences and mutual coordination imperceptibly and social spirit in empathy and empathy. In the artistic performance form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literary and musical beauty, it arouses endless imagination and obtains transcendent aesthetic feeling, so as to cultivate new people of The Times with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body,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bor.

Key words: mental training; choral music education; educational path



(上接第 29 页)

Construction of Teacher Candidates' ICM Disposition Development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tivity Theory

FANG Bi-yue, ZHANG Zhi-j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China)

Abstract: Professional dispositions involve a teacher's behavior inclination to achieve particular teaching purposes, the awareness of the self and context to employ appropriate knowledge and skills, demonstrating a teacher's professional attitudes, values and beliefs, thus being external performances of internalized teacher morality. Based on Activity Theory, the Teacher Candidates' ICM Disposition Development Model takes diverse tasks focusing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ICM and disposition evaluation as the mediating artifacts, U-S teacher education community as the platform for modeling and fostering teacher disposition, coordinates the tasks for developing ICM disposition by labor divisions in U-S teacher education community, and facilitat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 candidates and U-S teacher education community by rules. The model aims at exploring factors favorable for continuously fostering teacher candidates' disposition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er morality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 teacher disposition; ICM framework; teacher candidate; Activity Theory; U-S teacher education community